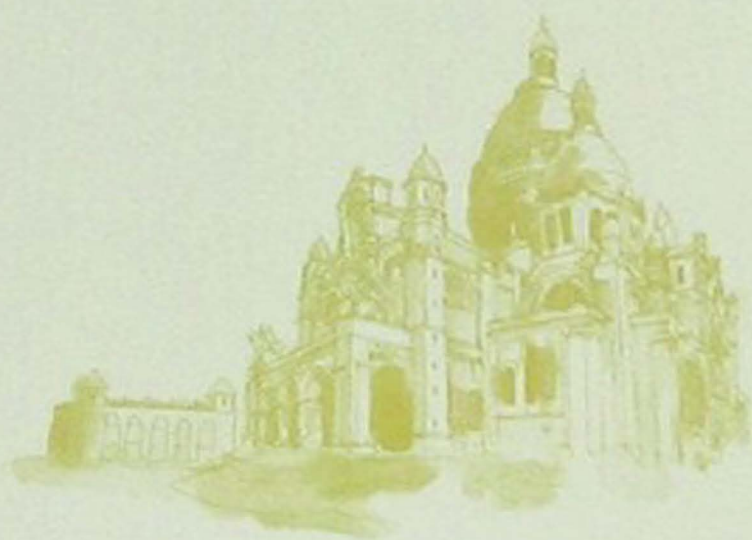


高等教育**历史**
转型的中外比较研究

邓磊 杨甜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历史转型的 中外比较研究

邓 磊 杨 甜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等教育历史转型的中外比较研究 / 邓磊, 杨甜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 12
ISBN 978-7-5689-2490-0
I. ①高… II. ①邓… ②杨… III. ①高等教育—发
展—对比研究—中国、国外 IV. ①G64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38599 号

高等教育历史转型的中外比较研究

GAODENG JIAOYU LISHI ZHUANXING DE ZHONGWAI BIJIAO YANJIU

邓磊 杨甜 著

策划编辑: 唐启秀

责任编辑: 唐丽 王献婵 版式设计: 唐启秀
责任校对: 关德强 责任印制: 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饶帮华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 (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01 千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89-2490-0 定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引 言

——大学演进的逻辑与“大变革时代”的意义

..... 1

第一章 大变革前夕：南北战争对美国大学传统

的冲击 17

第一节 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高等教育 18

第二节 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发展 41

第三节 南北战争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拓展..... 55

第二章 大变革伊始：德国理念的引入与“美国

模式”的初步显现 65

第一节 德国研究型大学理念与实践 66

第二节 美国大学对德国大学理念的引入..... 81

第三节 美国大学模式的初步显现 90

第三章 新的危机：转型后的理念冲突与质量问题

..... 100

第一节 理念冲突 100

第二节 质量问题 118

第四章 内涵发展:美国大学的理念焕新与品质提升	
.....	128
第一节 美国大学的理念焕新	128
第二节 美国大学的品质提升	139
第五章 现实反思:美国大学历史转型的当代思考	
.....	155
第一节 破除迷妄:高等教育变革的逻辑起点	155
第二节 内在省思: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守正与创新	
.....	179
第三节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维度与路径	190
参考文献	204

引言

——大学演进的逻辑与“大变革时代”的意义

自现代性开启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加速变化阶段，变化与革新成为常态。在狂风骤雨般的变革过程中，古老的组织和制度要么消失，要么改变，大学也无法幸免。与王朝、教会、手工业行会等历史悠久的社会组织不同，大学在社会变革面前既没有彻底消散，也不是一味被动接受改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保持核心传统的前提下，通过审慎的观察和理性的反思进行拓展和演进。此外，大学的演进也不是毫无规律，而是遵循一些基本逻辑。从历史过程来看，大学的演进明显呈现两个特征：一是连续性和渐进性，二是遵循“隐性的”社会契约。

一、大学演进的逻辑

大学诞生于12世纪的欧洲，在18世纪前，其组织形式和培养方式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自18世纪以来，大学的内涵和外延才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变革。根据办学体制、教学方式和社会功能的变化，克拉克·克尔把大学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以教学为核心功能的古典人文主义大学、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专门性大学，以及教学、科研、服务多元并举的现代综合性大学。教育社会学家赫斯荻根据欧美大学的发展特征和社会功能，也将大学的历史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到产业革命以人文主义为特点的博雅教育时代，第二阶段是产业革命后以技术为中心的专门教育时代，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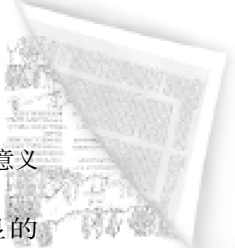
阶段是 20 世纪后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应用教育时代。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则在 1973 年提出“精英—大众—普及”的高等教育三阶段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 15% 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其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 15% 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化……当超过 50% 时，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化阶段。”^① 上述几种对高等教育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各有侧重，克尔主要是以大学功能为视角，赫斯荻侧重观察大学与经济的关系，特罗则是以大学的普及程度为指标。

事实上，在每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不同类型、不同国家的大学历史还可以细分成更多的时代。譬如，罗杰·L. 盖格根据大学课程、学生生活和大学结构，将美国大学自哈佛学院（哈佛大学的前身）以来 300 余年的发展历史分成十个阶段。^②但无论大学的演进如何划分，都必须把握两个基本原则。首先，大学的发展具有连续性。这一原则又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大学的组织和机构必须是有源头可寻、有历史可证，能够被清晰发现演进程序的；其二，一所大学最基本的办学精神和教学理念大体上是一以贯之的。其次，大学的变革具有渐进性甚至滞后性。对此问题也需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一方面，大学之所以能够一脉长存，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够坚守某些基本理念，同时对新的变化进行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另一方面，凡是大学发生变革的时期，也必是社会出现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说法反过来大致也可以成立。

根据连续性原则，作为知识中心和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应拥有持续而稳定的办学理念和文化特征。自中世纪肇始，大学之所以能够穿越八个世纪的历史烟云至今依然巍然耸立、历久弥新，而且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机构，根本原因就是这种机构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知识追求和文化传统。换句话说，大学之树常青的奥秘就在于

^① Martin Trow.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M]. Berkeley, CA: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973:12.

^② 罗杰·L. 盖格. 美国高等教育的十个时代[J]. 刘红燕, 译.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4): 126-145.



其知识功能和文化性格。保存和传播知识是大学最根本、最外显的组织功能，传承和发扬文化则是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沉淀而固化的内在品质。大学一方面以其内在的知识属性诠释与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精神，另一方面又因其外在的社会属性而成为文化选择、保存和传承的载体。从大学的历史来看，其文化性格具有普遍性。大学脱胎于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学校，最初只是天主教会传播教义、培养教士的文化机构。由于其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具有普世主义特征，因此大学从一开始就拥有求知无国界、研究无藩篱的文化性格。此外，大学的文化性格还取决于其从事的工作——科学研究与知识生产。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要包含三个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的方面：学问传授、科学与学术研究、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与其他两个方面密不可分。^①由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知识生产的规范性，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通过全面的观察、合乎方法论的思考以及作为客观性训练的自我批评来表达求知热情、展现科学精神的传统，并形成了稳定的认知范式和价值取向。这种文化性格不会因政权的更替和生产的发展而消失或改变，在宗教神学退出世俗生活，封建体制灰飞湮灭，人类社会发展到信息时代之时，大学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独特的内在气质。

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机构的连续性也是由大学的文化性格决定的。一所大学可能发生变化，譬如13世纪中后期，巴黎和牛津等地频繁发生较大规模的市校冲突，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曾一度因为市民的暴虐而不得不暂时解散。大学的学者也可以迁移，譬如早期大学基本上都是从巴黎和博洛尼亚迁移过去的师生所兴办。但是，无论一所大学怎样漂泊流离，其基本的章程、法令、学科和教学方法都具有明确传承关系，因此许多拥有古老历史的大学都形成了稳定的文化性格。建筑、校园、制度、法规甚至学科结构或许会在岁月长河的淘洗下改变样貌，但大学的精神理念和文化操守

^①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M]. 邱立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5-96.

却一以贯之。每一所伟大的大学基本上都具有稳定、独特的文化，这是保障其长期存在的基础，也是彰显其办学特色的标记。很难想象，如果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不再守护博雅雍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不再注重人文关怀，红砖大学^①不再追求技术进步，赠地大学^②不再致力于社会服务，清华大学不再奉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大学不再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些大学是否还有令人向往的魅力？

按照渐进性原则，作为人才中心和社会机构的大学，其发展变革必然与外部环境的重大转折密切相关。作为具有深厚积淀的组织，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大学的反应常常具有滞后性。首先，大学会对社会现实展开理性思考和价值评判，然后在已有理念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突破。英国近代哲人霍尔丹将大学称为“民族灵魂的反映”^③，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丁仲礼将大学视作“坚守社会良知的阵地”^④。弗莱克斯的论述更为全面，他指出大学的发展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大学不应将新事物拒之门外，不能落后于它们所表现和推动的生活，其办学理念和运行方式都会因时而变，从而既立足于现实又深刻影响未来；另一方面，大学的变革也应适度而明智，必须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限度，而非依赖于习惯，更不能成为时尚生活的风向标，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需求，但无需迎合社会欲望”。^⑤大学既保守又开拓，这是它们的天赋，但具体到不同国家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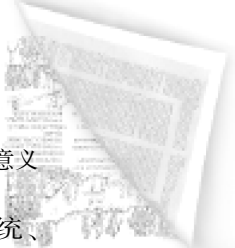
① 红砖大学，最初是指创立于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和大英帝国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在英格兰重要工业城市成立的六所私立研究及教育学院，创立之初均为科学和工程技术类院校，是除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以外在英格兰地区最顶尖、最著名的老牌名校。后来一些类似的大学也被归为红砖大学，这个概念逐渐变成1800年到1959年之间建立起来的数十所中产阶级大学。

② 赠地大学是由美国国会指定，得益于莫里尔法的高等教育机构。莫里尔法通过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赠与各州来兴办、资助教育机构。根据法案第40条，这些大学的宗旨在于教授农学、军事战术和机械工艺，不排除古典教育，使得劳工阶级子弟能获得实用的大学教育。

③ 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4.

④ 丁仲礼. 大学是坚守社会良知的阵地[EB/OL].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2016-06-06.

⑤ 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5.



同大学，这种天赋并不均一。大学变革受到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经济结构和知识体系等多个因素的影响，是一个牵涉范围极广泛、操作极复杂的长期过程。每当人类社会来到重要转折期，所有大学都必须做出反应，无论它们拥有何等显赫的声名和深厚的传统。有些大学由于历史久远、积淀深厚而十分注重传统并以此为豪，它们在转折期必须重新考虑如何适应和调整，实现传统与未来的对接。通常情况下，大学革新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已有基础上增添新内容，比如建立新学院、开设新学科、设置新课程等。这种革新手段操作便捷，效果明显，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容易引发内部矛盾，严重时甚至造成大学的分裂。另一种则是从整体上重新反思大学的精神与理念，并基于现实情形做出长远的价值判断，继而为传统赋予新的内涵。这种做法耗时较久，难度较大，甚至还会出现歧义和反复，但却是大学批判力和创造力的体现。当然，更常见的情况是二者同时出现，一方面是原有大学的自我反思和焕新，另一方面则是新院校的创建。

大学的发展历史证明，在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都有一批大学基于现实需求和价值反思进行理念嬗变和实践突破。那些能够自我反思并实现突破的大学，在未来仍然能够对人类社会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和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一部分还会跻身伟大大学之列，引领整个人类世界的思想与观念。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早期代表，以及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后起之秀皆属此列。时至今日，这些大学依然熠熠生辉，为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培养最杰出的人才。而那些缺乏批判精神、迎合社会流俗的大学，以及那些缺少应变、故步自封的大学，即使曾经伟大，也会逐渐黯然失色，甚至走向消亡。

二、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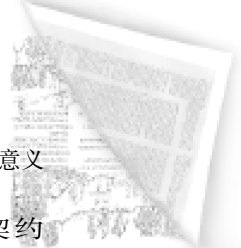
鉴于人类知识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大学不会轻易向自己所处的社会形态做出妥协，但却必然会对后者的变革做出认真的反思和审慎的选择。因此，大学与社会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显明表述。

(一) 大学在神学时代的诞生

大学诞生于12世纪的欧洲，当时正值“教会的道德权力和政治权力衰退而现代政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之时”^①。因神职人员无知堕落而逐渐遭遇信仰危机的天主教会迫切需要更加缜密和完善的神学理论提供支持；征服罗马帝国之后却陷入无序混乱状态的蛮族征服者则急需具有专业素养的公务人员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作为“黑暗时代”仅有的知识机构，脱胎于教会学校的大学承担了化育欧洲智慧的历史使命。大学通过知识的整理和传播连接神圣和世俗，切实起到了整合欧洲思维的功能。早期大学的功能与当时欧洲社会的需求是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德里克·博克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政治概念，但却是一个“启蒙式的隐喻”。^②早期大学的出现是一个缓慢而潜隐的过程。知识的复兴源自社会的发展，中世纪前期的蒙昧与野蛮逐渐催生出欧洲人对开化和文明的渴求，而传统的教会教育只能提供极其粗浅且在神学教义下作茧自缚的基本知识。11世纪之后，由于教派的分裂和教义的纷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纯洁的教会。这是一个旺盛的求知欲望将陈规陋习迅猛突破的年代，在信仰的召唤下，具有高度使命感的基督徒不断突破罗马教皇设置的壁障，寻找更纯粹的基督精神。十字军的征战则从另外一个层面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不仅使生活在四分五裂的欧洲版图上的人们得以相互交往，并且还向欧洲打开了一个可以瞭望陌生的东方世界的窗口。12世纪的欧洲学者先是从阿拉伯世界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智者，然后才慢慢回归到西方文明源头的学术传承。大学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只为教学而存在，教师以古希腊的自由七艺为基本授课内容，在此基础上开设法学、神学和医学等高阶学科，让学生修习高深精致的思想和知识，因此又被形象地称为“象牙塔”。从产生

^① 杰德勒·德兰迪.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 黄建如,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6.

^② Bok, D. *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5.



的背景和过程来看，中世纪的大学功能与社会发展之间隐含契约关系。由于教会神学和世俗统治的双重需求，教皇和君主不得不借助教师行会的力量，给予大学自治的权力。应教会和国家之需，大学的功能在于知识的保存和传授，培养兼具虔敬思想和专业知识的人才。

（二）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兴起

17世纪以来，“现代性”的大幕开启，知识分子开始为社会发展进行谋划。这一过程的根本动机是从“神圣”到“世俗”，从单纯强调内心的“信仰”转而关注真实的生活。中世纪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要，大学急需变革。20世纪前的人类社会现代性展演经历了从精神到制度再到深层社会认知的基本路径，其落脚点在于社会知识经验的沉淀与认知结构的系统化，具体表现为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兴起。

大学诞生于中世纪，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带有这个时代的烙印。长期以来，教会神学的故步自封和教学模式的刻板僵化一直禁锢着大学的发展。16世纪以来，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致使中世纪的社会秩序最终崩溃，教会退出世俗，与之关系密切的传统大学也逐渐走向衰落。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由单一民族或数个民族联合构成的民族国家成为主宰世界格局的政治实体，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被归入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之内，大学也不例外。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的出现，带来了欧洲社会对增加受教育机会和发展自然科学的渴求。但在这个时候，中世纪的古老大学仍然沉浸在陈旧的艺术知识和僵化的神学教条之中，因此必然会走向衰落。大学的衰落与社会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并行，这就推动了新的科研机构与教育机构的诞生，也为大学与社会之间隐性契约的重新商定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上半叶，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昭示着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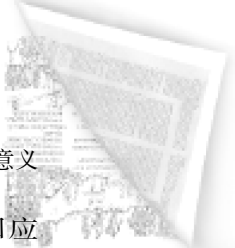
柏林大学成立于1809年，它的出现标志着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柏林大学的伟大之处在于首倡为研究高深学问而生、教学与科

研并重的高等教育新理念。柏林大学提出的学术研究理念深受 18—19 世纪的西方启蒙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影响。遵循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知识是科学探究的结果，大学是知识探究的场所。除却精神层面的哲学基础之外，新大学理念的提出还有赖于社会实践的变革。19 世纪初期，深受西欧工业革命震撼的德国政府官员和市场代言人对故步自封的学术体系不满之意日甚，于是联手实施改革以促进大学的现代化。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引导下，新大学的学术实践开始向官僚化和商业化转变。柏林大学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重新核准了大学的学术任务：首先，教授不需要是教导多样课程的通才，而是在各自的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其次，由于在学术传统（已确立的知识）和理性探究之间存在永恒冲突，因此各学科都需要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对已确立的知识进行再验并继续发展；最后，大学还需要以专业训练的形式进行组织和管理，致力于学术研究人员的培养。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19 世纪末期的德国大学已经成为领先世界的科研中心，为世界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处于迅速上升期的美国——所钦慕和仿效。

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是社会契约进行调整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就是工业革命的勃兴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科技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传统的小作坊、学徒制的知识传授方式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此作为知识中心的大学必须直接面对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市场的发展需要。从此，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开始进入大学课程，招生规模和渠道也有所拓宽，大学逐渐成为民族国家的科研中心，承担起科学研究和技术人员培养的功能。

（三）大学“服务功能”的出现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再次出现重大转折。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民主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带来无尽痛苦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共同造就了一个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更加频繁的人类社会。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此前由于自然因素而产生的社会隔离被新科技革命一一打破，所有的组织机构都需要以更主动的



姿态为社会做出贡献，为工业发展提供切实帮助。大学不仅要回应国家的利益诉求，还要体现社会和个人的公共价值。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各国大学纷纷做出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基于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和普遍盛行的实用思想，美国大学率先完成了社会契约的再次调适。在不断学习德国大学模式，并继续保持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英国大学模式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开始尝试用一种新的办学理念来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康奈尔计划”和“威斯康星思想”就是此背景下的产物。“康奈尔计划”始于19世纪后半期，当时美国处于工农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社会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著名的“莫里尔法案”，通过政府投资创建新型大学，着力培养工农业人才。以康奈尔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新大学由此成立，美国高等教育逐渐形成了通过提供实用知识来服务社会的传统。“威斯康星思想”出现在20世纪初期。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主张高等学校应该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由此，威斯康星大学在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通过培养人才和输送知识两条渠道，打破大学的封闭传统，努力发挥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新职能，积极促进全州的经济的发展。不久之后，威斯康星大学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而被其他大学所仿效。

积极寻求社会资源并为社会提供服务，成为20世纪初期美国大学的典型特色。服务理念打破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使其不仅能够体现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而且可以深入开展社会实践，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帮助。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实力的日益增长，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持续提升，社会服务理念逐渐推广到其他国家，并成为现代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

三、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变革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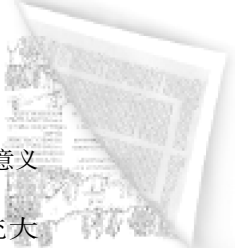
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数个世纪里，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在各国大学身上都有所体现。相对而言，由于移民国家的特殊性，美国最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历程。不仅如

此，作为西方文明在宗教、政治和文化等多重意义上的“新大陆”，美国大学还创造性地开拓了新的理念和功能。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三次战争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分水岭。第一次是独立战争，将美国大学分成殖民地时期和合众国时期，或者说传统时期与变革时期；第二次是南北战争，这是美国大学走向现代化的起点；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大学从此变得多元巨型、贴近社会，并因此赢得了世界声誉。除这三次战争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也对美国大学造成了不小影响，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其面貌。不过，这三次战争只不过是诱发变革的外在因素，真正导致美国大学脱胎换骨的时期并非这三个节点，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是美国大学最关键的变革期，而且对未来的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段历史不仅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美国大学”，而且为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样本。以哈佛大学为代表，这所成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精英大学在后来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高等教育后发国家竞相学习的对象，时至今日，这种趋势仍然在继续。

自1636年哈佛学院诞生以来，美国大学在之后的两个半世纪都乏善可陈。在此期间，整个新大陆的文化水平都无法与欧洲母国相提并论，新移民最大的成就是对蛮荒的北美大陆进行开垦，以及建立了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高校大多仍以心智训练和道德修养为目的，以希腊文、拉丁文等古典课程为内容，保留着浓厚的中世纪英国风格。转机出现在19世纪中期，南北战争以后，奴隶制被废除，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美国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的巨大进步以及对工业化的诉求，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人才要求。面对新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需要，美国大学作出的第一反应是学习来自德国的先进理念。

1809年，柏林大学建立，专业发展和科学研究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率先做出突破的德国大学也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对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美国学者大量译介德国大学的相关信息，



同时派出 10000 余人赴德留学。^①留德学者归国后立即致力于传统大学的改造，并在独立战争胜利百年之际建立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就此扎根，以科研为中心的组织模式成为美国大学的普遍取向。19 世纪后半叶，为促进工农业技术发展，联邦政府又于 1862 年、1890 年两次出台《莫里尔法案》，划拨联邦土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初步形成了以实用课程为内容、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公立大学体系。至 20 世纪初，科技创新与专业教育已经根深蒂固，以心智训练和虔敬精神为导向的旧传统全面让位于培养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的新理念。

以“学术研究”为主旨、“实用主义”为目的，美国大学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个过程急促而剧烈，虽然整体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缺乏独立内生的教育理念以及过度重视实际功用，因此造成了严重危机。美国大学最初是以中世纪的英国书院为模板，后于 19 世纪中后期以德国研究型大学为模板进行改造，其间还对法国大学有所借鉴。多方学习具有积极意义，但一味模仿的后果却是理念模糊、体系混乱。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虽然有助于美国高等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但由于实利思想盛行，同时缺乏德国文理中学和英国文法教育的通识根基，美国大学逐渐沦为实用知识和应用技术的“交易市场”，“学生的兴趣与大学的真正目的相偏离，成为最严峻的问题”^②。由于重研究轻教学、重实利轻思想，美国大学的职业特征愈发明显，文化生活却日趋衰落，从而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原创思想匮乏。直至 19 世纪末，“美国大学几乎未能培养哪怕一位执思想界之牛耳的伟大学者”，“由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接踵而来的拜物主义浪潮，最具才华的年轻人大多不愿踏上求学问道的幽径”^③。上述现象不仅令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而且也让美国公众对大学失去了信任。批评者认为美国大学主要存在两个危机：

^① Charles Franklin Thwing. *The American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M]. New York: Macmillan, 1928:39-43.

^② Edwin Slosson.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ies*[M]. New York: Macmillan, 1912:506.

^③ Abbot Lawrence Lowell. *At War with Academic Traditions in Americ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46.

其一，片面强调研究，忽略本科教育；其二，过于注重实用，缺乏具有文化内蕴的大学生活。前者导致美国大学根基不牢，徒有创新欲求但缺乏原创精神。后者更是诱发了两个重大问题的出现：教育内容零碎分散，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学生视野狭窄、根基浅薄，既无法满足民主社会对公民品格的要求，也难以体现“美国学者”的文化内涵。为引领美国大学走向卓越，一批富有远见的改革者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内涵的提升，从而拉开了“大变革”的帷幕。

美国高等教育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变革始于南北战争之后。历史学家劳伦斯·维赛认为，“对于经历了1870年的人来说，1870年前后可以看作‘美国教育史的新纪元’”。对此，他援引了耶鲁大学校长诺亚·伯特1871年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评论：“这一课题从没有吸引如此之多的人进行如此之热切的思考。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它（高等教育）激发了有史以来最为积极的争论，引起最多样化或是自信的批评，经历了最多的实验。引导公众观点的人们的思想是如此易变，对于旧的方法和学习或真或假的缺陷的批评是如此尖锐，要求进行彻底变革的决心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经常评论说，学院和大学教育不仅仅是被改革所改变，而且是被革命所震撼。”^① 以上论述是切合实际的，也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节点相契合。但是，战争和政治对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只是一个转折的契机，真正的改革动力还是来自社会内部需求的转变。

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美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大变革时代”。关于“大变革时代”的说法，最先出自20世纪初的美国记者埃德温·斯洛森。斯洛森在1910年前后完成了一次全美范围内的院校旅行，并在调查基础上撰写了《伟大的美国大学》这部经典文集。书中写道：“我一共拜访了十四所大学，在每一所大学都能听到这样的议论：‘你来得正是时候。这所大学恰好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② 20世纪中期，历史学家劳伦斯·维赛以深厚

① 劳伦斯·维赛. 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M]. 栾鸾,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② Edwin Slosson.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ies*[M]. New York: Macmillan, 1912: 506.